

三聯人文書系

陳平原 主編

葛劍雄 著

人文千秋



ISBN 978-962-04-3137-1



9 789620 431371



聯合出版集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HK\$ 88.00

<http://www.jointpublishing.com>

陳平原 主編

二聯人文書系

葛劍雄 著

人文千秋



三聯人文書系

主 編 陳平原

責任編輯 向婷婷

書籍設計 鍾文君

書 名

人文千秋

著 者

葛劍雄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三〇四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版 次

二〇一一年八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三十二開 (141×210 mm) 一二五二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37-1

© 201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總序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

得非追韓摹柳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餘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着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裡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書店

向有出版大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劃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着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

拙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目錄

小序	001
「炎黃子孫」不是中華民族或中國人民的代名詞	005
再論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和分裂	021
歷史人才分佈研究二題	043
論中國的大古都的等級及其量化分析	055
——兼答安陽能否列為「七大古都」	071
就事論事與不就事論事	083
——我看《懷柔遠人》之爭	103
教育問題之我見	127
我的人文和科學觀	
新版世界地圖引發的爭議	
——《蘋果裡的五角星》——〈系列世界地圖〉誕生紀實》序	

科舉制度：存廢皆有理	135
尊重歷史，立足現實	141
評《一四二一：中國發現世界》	153
——兼論真實史料的重要性	153
遷徙的姓氏：追尋移民的腳步	171
從歷史地理看長時段環境變遷	187
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與學術國際化	199
中國人的信仰	213
城市品性	223
作者簡介	236
著述年表	238

小序

以往平原兄約我編書，有過愉快的合作。此次平原兄邀我加入香港三聯書店「三聯人文書系」計劃，我自然欣然應命。差不多同時，李輝兄為復旦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三十年集」，將我列入名單，義不容辭，我也答應了。待到在電腦前檢索舊稿時，方才發現這兩套書都是以「三十年」為編輯的範圍，並且都要求以本人有代表性的學術性文字為主。

其實，對我們這一代學人來說，「三十年」幾乎就是學術生命的全部。我是過了而立之年才從中學進入大學，中學畢業後當中學教師十多年後才有機會讀研究生。到一九七九年方將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印刷品，一九八〇年方使自己的名字成為學術刊物上的作者。「三十年集」等於是自己全面的選集，要同時編兩種頗使我為難。好在兩種書的宗旨和篇幅稍有不同，經過考慮，我總算理出一個頭緒，確定了並行不悖的選編辦法——「三十年集」自一九八〇年—二〇〇九年，每年選一篇，以學術論文為主，兼及其他，如回憶、評論等，自一九七八年起每年都有「紀事」一項，全面反映三十年來的學術和人生，近三十萬字。「三聯人文」也以時間為序，只選個人學術專著所涉領域以外的學術文章，以十萬

餘字為限。兩書所選各異，無一重複。

在以往三十餘年間，我在人口史、移民史、統一和分裂、歷史疆域、地圖測繪、環境變遷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通過若干專著或普及性學術著作發表。本書所選，都是在這些專著之外的。除學術方面外，還涉及教育、信仰等社會問題，但也是從學術視角出發的，自問符合「最能體現自家學術心得及貢獻」，「有較大的接受面」的編撰體例。

本書名為《人文千秋》，一方面是呼應「人文」書系，另一方面，如考慮的所收文字涉及的範圍基本屬歷史人文地理。在「人文」後加上「千秋」二字，說明這些都屬歷史，都屬過去。即使所議社會問題發生在今天，其實都是從遙遠的過去演變而來的。取這個書名，也源於一段往事。二〇〇六年秋，我隨「重走玄奘路」的車隊翻越天山，進入吉爾吉斯斯坦，經過伊塞克湖（唐代熱海）、碎葉城遺址、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唐大宛都督府）、撒馬爾罕（唐康居都督府）、唐代鐵門關，進入阿富汗，翻越興都庫什山，到達喀布爾（唐細柳州），沿喀布爾河而下，越過開伯爾山口。一路所經，都曾是唐朝的疆域，如今早已是異族異國，當年的赫赫武功和恢宏建制已難覓蹤影。感慨之餘，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惟有人文足千秋》。

這些文章都是公開發表過的，遵編撰體例，均於文末註明原刊的名稱和時間。除糾正

了個別錯、漏以外，未作修改，以存本來面目。

所編「著述年表」，按年收集了已發表專著、論文集、隨筆集、雜文集、時評集、譯書，但為節約篇幅，未列入所編書。

辛卯年元宵於浦東寓所

「炎黃子孫」不是中華民族或中國人民的代名詞

近年來，「炎黃子孫」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已經由文人學者擴大到社會各界，由詩歌小說擴大到報刊上各類文章，甚至已進入黨政領導人的正式言論和官方文件，似乎成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同義詞，而且大有取代這兩個詞的勢頭。與此同時，修整炎帝、黃帝的陵墓，舉行隆重的祭典，頌揚炎黃二帝的文字，表達中國人尤其是海外華人如何崇拜炎黃二帝的報道也大量湧現。原因很簡單，據說炎帝和黃帝是我們的兩位共同祖先，當然也應該是台灣、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華人、華裔的共同祖先。既然十多億中國人和華裔都是同一血統，似乎就理應是一家人了。人們以為提炎黃子孫就能促進國家的統一和人民的團結，至少能增進共同的感情。

但是，良好的願望不能改變歷史事實和國內外的現狀，濫用炎黃子孫的提法更會造成不良後果，恰恰不利於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

首先，這種提法不符合華夏（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瞭解，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商文化的遺址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夏文化遺址雖然已有了發現的報道，但還有待於科學的鑒定和深入的研究，比夏代更早的炎帝黃帝時代目前還找不到任何物證。根據現有的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知識分析，炎黃二帝至多只是當時很多部落首領中的兩位，他們的活動範圍和影響力自然是有限的。

即使僅從文字記載看，也明確地說明了這只是一種傳說，絕不是確切的歷史記錄。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結尾不得不感歎：「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面對各種各樣的傳說，這位二千多年前的史學家最後也不得不取了《春秋》、《國語》的說法，而「弗深考」，不再仔細考查事實究竟如何。

根據《史記》的記載，我們這兩位老祖宗原來是一對冤家。炎帝是天子，但實力衰退，統治不了諸侯；而黃帝卻文武兼資，爭取到了諸侯的支持，又動用了豺狼虎豹，與炎帝大戰三次，將他徹底打敗，自己做了天子。炎帝甘拜下風，成了黃帝的屬臣，這兩個部落也合二為一了。但《史記》和其他史書都提到了炎黃二帝曾爭取、統治過的諸侯，除非這眾多諸侯的子孫後代都跑到地球的其他地方去了，或者統統斷子絕孫，否則今天的中國人總該有一部分是他們的後代啊！

退一步說，即使早期的華夏族的成員都是炎黃的後代，那麼史書上也還記載了大量非華夏部族的存在。考古發掘已經證明，數千處舊石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可分為多種類型。近年來在長江流域、東北地區等地的考古新發現更證明了中國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時期，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還有不少非華夏的部族，更不用說在中原以外。這些部